

#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

## ——来自中国 900 家村镇银行的证据

李倩<sup>1</sup>, 何广文<sup>2</sup>, 陈晓洁<sup>2\*</sup>

(1.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 北京 100043; 2.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基于 900 家村镇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考察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存在促进效应;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其安全性和成长性具有抑制效应; 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基层网点扩张”和“人员配置增加”双重机制提升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 “交易成本增加”是量化定位监管削弱村镇银行成长性的重要机制。金融科技发展能增强量化定位监管对社会绩效的影响, 但是对盈利性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 量化定位监管; 村镇银行; 社会绩效; 财务绩效; 金融科技

中图分类号: F832.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3)06-0001-12

## Effect of quantified positioning supervision on th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village and town bank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of 900 village and town banks in China

LI Qian<sup>1</sup>, HE Guangwen<sup>2</sup>, CHEN Xiaojie<sup>2\*</sup>

(1.China Micro-credit Companies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43,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900 village and town bank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quantified positioning supervision on th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village and town banks have been examin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quantified positioning supervision has a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village and town banks' financial service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profitability, and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their safety and growth. Through "expansion of the base network" and "increase of staffing", social performance of village and town banks has been promoted. "Increase of transaction cos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quantified positioning regulation to weaken the growth of rural and town banks.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could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quantified positioning regulation on social performance but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profitability.

**Keywords:** quantified positioning supervision; village and town banks; so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performance; financial technology

### 一、问题的提出

村镇银行是原中国银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自 2006 年起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

收稿日期: 2023-09-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173121); 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202206350104)

作者简介: 李倩(1979—), 女, 内蒙古包头人, 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理论与政策。\*为通信作者。

准入政策而诞生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了防止村镇银行“逃离”农村金融市场和防范金融风险, 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坚持“宽准入、严监管”的原则, 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定位监管措施。定位监管是监管部门针对村镇银行所采取的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差异化监管手段, 演进路径经历了从“定性”到“量化”的过程。

定位监管从定性向量化转变, 对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会产生何种影响? 对该问题的

解答有助于检验量化定位监管这一外部干预行为对农村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效应和福利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从全球视角探讨了监管对微型金融机构(MFIs)财务绩效的影响<sup>[1-3]</sup>,但中国针对村镇银行所采取的定位监管方式与全球其他地区对微型金融机构的监管策略存在差异,因此,基于全球性宏观分析得到的结论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形。且已有研究并未进一步揭示监管对金融机构多维绩效的影响机制,也不利于理解监管影响金融机构绩效表现的理论逻辑。

鉴于此,本研究拟在深入刻画中国村镇银行定位监管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并基于900家村镇银行2008—2016年的微观数据对理论假设予以验证,以期为理解中国情境下的村镇银行监管策略与多维绩效间的关系提供增量知识和经验证据。

## 二、村镇银行定位监管的变迁

在村镇银行的培育发展进程中,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的定位监管思路逐渐清晰并不断演进。按照定位监管的程度和方式,村镇银行定位监管的变迁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 (一) 2006—2011年定位监管的宽松定性时期

这个阶段,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的定位监管要求在试点摸索中逐步明确,但仍主要局限于对服务区域、服务对象的定性描述上,尚未提出量化的监管要求。2006年末,监管部门在首个村镇银行文件《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银监发〔2006〕90号)中,提出村镇银行要“将在当地吸收的资金尽可能多地用于当地”,定位监管仅局限于资金的投放区域;2007年5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银监发〔2007〕46号)则更加明确地将村镇银行定位为“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服务社区”;2010年5月印发的《关于村镇银行贷款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38号)要求村镇银行“扎根县域,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宗旨……确保有效的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需求得到满足”,将村镇银行的信贷服务定位从单纯“支农”扩展到了“支农支小”;2011年1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13号)进一步提出压缩大额贷款、

严禁贷款集中度超标的要求,并对“超比例发放大额贷款不能限期压回”“偏离支农服务方向”的村镇银行加大处罚力度。

### (二) 2012年以来定位监管的严格量化时期

为纠正村镇银行在支农支小定位上的偏离,监管部门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的村镇银行监管处室,开始对村镇银行的定位监管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2012年1月,监管部门印发《村镇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银监发〔2012〕1号),对村镇银行设定了包括农户和小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户均贷款余额等指标在内的农村金融服务状况评价指标,这是监管部门首次对村镇银行的服务定位制定了明确的、量化的监管指标,以确保村镇银行支农支小服务定位的实施;2014年5月,监管部门印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村镇银行非现场监测预警体系的通知》(银监办发〔2014〕135号),将“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合计占比、户均贷款余额、净上存主发起行资金比例、单户500万元(含)以下贷款余额占比”等支农支小指标明确为村镇银行特色化监管指标,并开展非现场监测;2014年12月,监管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村镇银行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4〕46号),首次在正式文件中强调要强化村镇银行有限持牌经营,限定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村镇银行的功能定位。2017年11月,监管部门印发《关于印发村镇银行监管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7〕52号),对村镇银行培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给予解答,并对村镇银行市场定位给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立足县域、立足支农支小、立足基础金融服务、立足普惠金融”,明确村镇银行应“以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为主”。2019年12月,监管部门印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村镇银行坚守定位提升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能力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19〕233号),对各项贷款占资产的比例、新增可贷资金用于当地的比例、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以及户均贷款都做出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各项贷款占比不低于60%,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占比不低于70%,户均贷款不高于100万元(注册地在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全国百强县的机构可放宽至150万元)”。

总体来看,定位监管作为监管部门针对村镇银行采取的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差异化监管手段,演进路径经历了从“定性”到“量化”的过程。量化定位监管以2012年印发的《村镇银行监管评级

内部指引》(银监发〔2012〕1号)首次对村镇银行市场定位制定明确、量化的监管指标为起点。2012年起,监管部门开始加大对村镇银行定位监管的力度,引入定量指标对其支农支小经营行为进行约束,并将定量指标表现与监管评级、风险预警挂钩,试图通过量化的方式提高村镇银行定位监管的有效性。

### 三、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绩效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

#### (一)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

量化定位监管是监管部门针对村镇银行实施的监管措施,主要通过将农村金融服务指标写入评级文件对村镇银行实施硬约束,督促其下沉业务重心,服务更多的农户和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量化定位监管方式具有监管对象明确、监管规则具体而清晰的重要特征,降低了监管部门与村镇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监管成本,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更凸显。同时,量化定位监管限制了村镇银行的投资渠道,有助于化解其资金投向“去农化”“大额化”的目标偏移问题。村镇银行出现目标偏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农项目与涉农项目间以及大项目与小项目间存在资金投资收益率缺口<sup>[4]</sup>。非农项目和大项目的投资收益率高于涉农项目和小项目越明显,村镇银行偏移政策性目标的动力越强。在定位监管的探索期(2006—2011年),监管部门对村镇银行的监管要求以“确保有效的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需求得到满足”“支农支小”等定性描述为主。村镇银行为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投资渠道“非农化”和“大额化”现象显现。2012年以后,监管部门采取量化定位监管模式,限制了村镇银行的投资渠道,这有助于化解村镇银行的目标偏移问题,提升金融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对社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

量化定位监管限制了村镇银行的投资渠道,给其财务绩效带来不利影响。首先,从资产投资组合角度分析,非农项目和大额项目的投资收益可能是村镇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而量化的监管规则压缩了村镇银行的获利渠道,使其利润最大化的资产投

资组合难以实现,从而削弱其财务绩效<sup>[5]</sup>。其次,为满足量化定位监管措施的要求,村镇银行服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小微群体,面临的信贷风险较高,安全性下降。最后,相较于大额贷款,小微群体的贷款需求具有小额、分散的特点。在付出相同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情况下,村镇银行能办理的小微贷款业务规模会比大额贷款业务规模小得多,贷款规模增长缓慢,成长性受阻。严格监管还会增加村镇银行的“守法成本”<sup>①</sup><sup>[6]</sup>和经济负担<sup>[7]</sup>、削弱村镇银行的行业竞争力<sup>[8]</sup>和倒逼影子银行扩张<sup>[9]</sup>。在利润空间受限、守法成本增加和竞争优势削弱等多重挤压下,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具有抑制效应。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产生抑制效应。

#### (二)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作用机制

量化定位监管能促使村镇银行通过增加基层网点和人员配置等方式满足监管要求,进而提升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

在乡村地区数字鸿沟尚未弥合的背景下<sup>[10]</sup>,铺设网点仍然是村镇银行获取基层客户“软信息”、与弱势群体建立紧密联系的主要手段。尽管数字金融正在普及,但受制于单体规模小、金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等,村镇银行尚未广泛使用数字金融。村镇银行要想在农户、小微企业等弱势群体中提高服务渗透度,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更加基层的农村地区增设网点、缩短服务半径。一方面,基层网点扩张有利于村镇银行在农村基层地区扩展业务、扩大服务覆盖面和提高信贷可得性。另一方面,基层网点扩张能够提升村镇银行在农村金融业务中“软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根据“小银行优势”理论,服务半径短、组织层级少等有利于小银行获取和处理“软信息”,为客户提供关系型信贷<sup>②</sup>,减少信贷配给。村镇银行在更加基层的农村地区设立网点,缩短与客户的地理距离,能够更好地发挥“软信息”获取优势,减少信息不对称,既有利于与农村基层地区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也有利于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和改善风控能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量化定位监管能够促使村镇银行在农村基层地区增设网点,促进社会绩效。

村镇银行定位监管的目标是服务更多的弱势群体、提供更低额度的贷款。发放小额贷款是高成本业务，“小额、分散”的信贷服务机制，要求村镇银行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对于小额、分散的信贷业务而言，同样的贷款规模，由于户数、笔数大幅增加，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小额信贷业务因此属于“劳动密集型”业务，增加与信贷业务相关的人力资本配置，有助于村镇银行针对更多农户与小微企业开展营销工作，扩大服务覆盖面。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量化定位监管能够促使村镇银行增加人员配置，提升贷款的服务广度，促进社会绩效。

### （三）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量化定位监管促使村镇银行扩张基层网点、增加人员配置等，村镇银行的交易成本增加。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绩效的影响路径如图 1 所示。已有研究表明，遵循审慎监管原则并处理具体的被监管事务将导致不小的成本<sup>[11,12]</sup>。特别是对于微型金融机构，由于规模约束，被监管成本远高于其他银行<sup>[13]</sup>。一方面，基层网点扩张会增加村镇银行的交易成本。村镇银行设立的基层网点仍以传统网点为主，按照公安、监管等相关部门的要求，传统银行网点在选址、装修、安保等方面均有严格规定，前期开办费会对村镇银行会造成不小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人员配置增加也会导致村镇银行交易成本的增加。与大额贷款相比，小额贷款管理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更高<sup>[13]</sup>。而且，监管被证明也会导致总部员工占比上升<sup>[5]</sup>。村镇银行面临量化定位监管，在大量增加基层员工的同时，还需雇佣相对高成本的技能型劳动力去起草监管所需的报告、处理信息披露和对接监管各类现场检查事宜。这部分员工并不直接促进服务广度、深度等社会绩效的提升，但却给村镇银行增加了额外的管理成本。而且，人员配置的快速增加，对村镇银行的技能培训、风险管理等工作提出了挑战，甚至可能会对资产的安全性不利。此外，定位监管还会给村镇银行带来其他隐性或不易测量的交易成本。比如，村镇银行所服务的基层弱势群体，兼具低收入与脆弱性特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部分弱势群体存在逆向选择行为和道德风险，会推高村镇

银行处置经营风险的交易成本。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增加村镇银行的交易成本，对财务绩效产生抑制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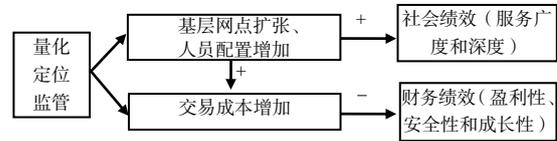


图 1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绩效的影响路径

## 四、研究设计

### （一）变量说明与指标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

参考国际研究对微型金融机构，以及国内研究对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进行绩效评价的通用做法<sup>[14-18]</sup>，本研究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度量指标做如下选择：社会绩效包括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其中服务广度使用贷款户数来表示，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村镇银行服务的贷款客户越多，社会绩效越好；服务深度以户均贷款余额表示，指标数值越小，说明村镇银行户均贷款余额越小，服务的客户越基层，社会绩效越好。在实证分析中，将贷款户数进行取对数处理。财务绩效包括盈利性、安全性、成长性三个方面，其中盈利性以资产利润率表示，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安全性以不良贷款率表示，指标数值越小，说明村镇银行的资产安全性越好；成长性以贷款规模增长率表示，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村镇银行的成长性越高。

#### 2. 核心解释变量：量化定位监管

村镇银行的定位监管体系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监管政策与标准的制定，地方监管局按照全国统一的监管政策及标准对准入审批、现场检查等具体监管措施进行执行。因此，村镇银行虽为地方性小法人银行机构，但监管政策在全国层面总体是统一的，所以本文将量化的定位监管要求发布的时点作为是否接受量化定位监管的衡量标准。

虽然监管部门在设立村镇银行之初就提出了支农支小的定位监管要求，但查阅 2007—2019 年监管部门发布的所有针对村镇银行的监管文件发

现，直到 2012 年 1 月，《村镇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银监发〔2012〕1 号）才首次对村镇银行设定了包括农户和小企业贷款余额占比、户均贷款余额等指标在内的农村金融服务状况评价指标。因此，本文将 2012 年作为村镇银行接受量化定位监管的起点，用 *regulation* 表示，设定接受量化定位监管的年份（2012—2016 年）为 1，其他为 0。

考虑到监管政策传导可能存在时滞，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将量化定位监管政策实施后 1 年的时间点（即 2013 年）作为量化定位监管发挥作用的时间起点，考察量化定位监管政策影响村镇银行双重绩效的时滞效应。内部监管评级指引由监管部门内部掌握，一般不提前向社会公众及村镇银行公开。村镇银行可能在次年 3—4 月份监管评级结果出来以后才获知具体失分原因，从而对次年的经营策略

进行调整。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中，加入量化定位监管实施 1 年后的代理变量（*regulation*<sub>1</sub>）。其中，2008—2012 年，*regulation*<sub>1</sub> 取值为 0；2013—2016 年，*regulation*<sub>1</sub> 取值为 1。

### 3. 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sup>[19-23]</sup>及中国的村镇银行经营实际，控制变量包括主发起行特征、银行经营特征和市场环境特征。其中，主发起行特征包括主发起行持股比例和发起银行数量，银行特征包括享受定向费用补贴、运营时间、资产规模、资本规模、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成本收入比、存贷比，市场环境特征包括村镇银行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和金融业竞争水平。为减少异方差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对资产总额和资本规模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具体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单位	变量定义	变量指标选取与赋值	均值	
					未接受监管	已接受监管
被解释变量	社会绩效 <i>bor</i>	户	服务广度	贷款户数	643.37	1104.96
	<i>alb</i>	万元/户	服务深度	户均贷款=贷款余额/贷款户数	113.60	85.15
	财务绩效 <i>roa</i>	%	盈利性	资产利润率=税后净利润/平均资产规模×100	1.22	1.33
	<i>npl</i>	%	安全性	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100	0.11	1.09
	<i>growloan</i>	%	成长性	贷款规模增长率=(贷款余额-上一年度贷款余额)/贷款余额×100	58.40	25.23
核心解释变量	量化定位监管 <i>regulation</i>	(虚拟变量)	是否接受量化定位监管	接受量化定位监管为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主发起行特征 <i>shareholder</i>	%	持股比例	主发起行持股金额/实收资本×100	45.88	49.01
	<i>quantity</i>	家	发起银行数量	主发起行发起村镇银行的数量	4.62	17.71
	银行经营特征 <i>sub</i>	(虚拟变量)	定向费用补贴	当设立的村镇银行在西部地区开业 5 年内、中部 4 年内、东部 3 年内，取值为 1，否则为 0	1	0.71
	<i>age</i>	年	运营时间	观测年-成立年	1.44	3.37
	<i>asset</i>	万元	资产规模	资产总额	55 595.08	91 923.84
	<i>capital</i>	万元	资本规模	实收资本	6414.83	8184.85
	<i>cap</i>	%	资本充足率	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100	32.16	24.67
	<i>lr</i>	%	流动性比例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	78.65	84.05
	<i>cir</i>	%	成本收入比	(业务管理费+其他营业支出)/(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100	64.71	55.40
	<i>idrs</i>	%	存贷比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100	77.36	93.93
	市场环境特征 <i>mar</i>		市场化水平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维度指标值	6.14	7.03
	<i>comp</i>		金融业竞争水平	中国市场化指数中金融业竞争程度维度指标值	7.71	9.12
中介变量	基层网点 <i>branch</i>	个	网点数量	不包含总行营业部	0.65	2.45
	人员配置 <i>sa</i>	人/百万元	人员配置	每百万元资产的人员配置=员工人数/资产总额×100	0.40	0.32
	交易成本 <i>oer</i>	%	交易成本	营业支出占比=营业支出/资产总额×100	1.93	2.52

## (二) 实证模型设计

1. 量化定位监管影响村镇银行双重绩效的基准回归模型

以村镇银行的绩效为被解释变量，量化定位监管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Performance_{i,t} = a_0 + a_1 regulation_{i,t} +$$

$$a_2 Controls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表示第  $i$  家村镇银行,  $t$  表示  $t$  年;  $a$  为待估参数,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Performance_{i,t}$  代表衡量村镇银行绩效的指标,包括社会绩效、财务绩效两类指标;  $regulation_{i,t}$  代表村镇银行是否接受量化定位监管;  $Controls_{i,t}$  代表控制变量,包括主发起行特征、银行经营特征和市场环境特征变量。  $\mu_i$  和  $\gamma_t$  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 2.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双重绩效影响机制的检验模型

本文采用 Baron & Kenny 的经典三步法<sup>[24]</sup>,逐步检验量化定位监管政策能否通过“基层网点扩张”“人员配置增加”和“交易成本增加”机制对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在式(1)的基础上,形成中介效应模型:

$$Med_{i,t} = \beta_0 + \beta_1 regulation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u_i + \lambda_t + e_{i,t} \quad (2)$$

$$Performance_{i,t} = c_0 + c_1 regulation_{i,t} + c_2 Med_{i,t} + c_3 Controls_{i,t} + \theta_i + \omega_t + \delta_{i,t} \quad (3)$$

在式(2)与式(3)中,  $Med_{i,t}$  为中介变量,具体包括“基层网点”“人员配置”和“交易成本”,分别使用网点数量、每百万元资产的人员配置和营业支出占比来度量。

估计系数的含义:  $a_1$  代表量化定位监管 ( $regulation_{i,t}$ ) 对村镇银行绩效 ( $Performance_{i,t}$ ) 的总效应,  $\beta_1$  代表量化定位监管 ( $regulation_{i,t}$ ) 与中介变量 ( $Med_{i,t}$ ) 的关系,  $c_1$  代表加入中介变量 ( $Med_{i,t}$ ) 后,量化定位监管 ( $regulation_{i,t}$ ) 与村镇银行绩效 ( $Performance_{i,t}$ ) 之间的关系。当  $a_1$ 、 $\beta_1$  和  $c_2$  同时显著时,中介效应显著。

## 五、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普惠金融团队与中国银行业协会合作开展的村镇银行培育发展成效问卷调查。该调查共收集整理了1015家村镇银行2008—2016年的主要经营数据<sup>③</sup>。在剔除重复样本和数据缺失严重样本后,最终使用900家村镇银行2008—2016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3789个观测值。样本分布覆盖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5个计划单列市<sup>④</sup>。地区层面的

市场环境特征变量数据来自樊纲等在2018年编制的2008—2016年中国市场化指数。

样本数据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时间分布来看,观测值个数在2008—2016年逐年增加,符合村镇银行每年均有新设机构的实际。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41.20%,中部地区占29.93%,西部地区占28.87%,与全国村镇银行的空间结构基本保持一致,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2 样本分布情况

年份	区域			小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2008	9	11	9	29
2009	29	20	29	78
2010	30	24	36	90
2011	89	58	67	214
2012	168	124	118	410
2013	227	173	168	568
2014	274	207	208	689
2015	352	245	224	821
2016	383	272	235	890
合计	1 561	1 134	1 094	3 789
区域占比	41.20%	29.93%	28.87%	100.00%

为更加直观地分析差异,将样本按照是否接受量化定位监管分为两类。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具体分析如下:

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的平均贷款户数为643.37户,远低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1104.96户);户均贷款余额为113.60万元,远高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85.15万元)。由此可以看出,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无论是在服务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均优于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总体而言,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的财务绩效优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的资产利润率(1.22%)略低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1.33%),但不良贷款率均值远低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贷款规模增长率(58.40%)远高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25.23%)。可见,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的安全性、成长性均明显优于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已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的存贷比为93.93%,明显高于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77.36%),同时基层网点数和交易成本都较未接受量化定位监管样本大。

## （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以 2008—2016 年 900 家村镇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量化定位监管对其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在估计方法选择上，由于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检验统计量为 159.84，对应的  $p$  值接近于 0，有充分理由拒绝原假设，说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同时，检验所有年度虚拟变量的联合显著性发现，时间虚拟变量联合显著，存在时间固定效应。本研究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同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为避免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使用稳健标准误进行估计推断。同时，采取方差膨胀因子法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得到  $VIF=2.38$ ，远小于 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考察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

变量	社会绩效		财务绩效		
	服务广度 (1)	服务深度 (2)	盈利性 (3)	安全性 (4)	成长性 (5)
量化定位监管	2.201 9*** (0.554 3)	-207.947 5*** (47.176 6)	-1.812 5 (1.197 6)	4.856 8*** (1.417 5)	-111.165 1*** (35.460 6)
持股比例	0.002 6 (0.002 1)	-0.258 8 (0.242 1)	-0.004 7 (0.004 4)	0.010 2 (0.006 7)	0.001 6 (0.117 1)
发起银行数量	0.003 9*** (0.001 5)	0.415 9*** (0.149 9)	0.011 8** (0.004 7)	0.005 8 (0.005 2)	-0.402 2*** (0.078 8)
定向费用补贴	0.018 5 (0.024 2)	6.916 9*** (2.674 4)	0.283 6*** (0.062 9)	0.239 0** (0.093 3)	-10.719 9*** (1.160 2)
运营时间	-0.077 8 (0.065 6)	15.111 7*** (4.959 6)	0.065 6 (0.129 0)	0.051 8 (0.157 2)	-2.521 0 (4.373 3)
资产规模	0.482 8*** (0.053 7)	8.905 7 (5.464 6)	0.355 4* (0.193 8)	-1.031 1*** (0.255 3)	8.247 0*** (2.172 3)
资本规模	0.003 9 (0.061 7)	24.518 7*** (6.223 5)	0.008 5 (0.197 8)	-0.051 0 (0.145 6)	11.015 3*** (2.339 3)
资本充足率	-0.007 9*** (0.001 4)	0.118 3 (0.218 8)	0.006 9 (0.007 4)	-0.012 6* (0.006 8)	-0.107 5 (0.066 2)
流动性比例	-0.001 1*** (0.000 2)	0.040 7 (0.034 9)	0.000 3 (0.000 8)	0.001 9 (0.001 6)	-0.021 0** (0.010 6)
成本收入比	-0.002 1*** (0.000 7)	-0.063 8 (0.081 0)	-0.031 4*** (0.002 5)	0.005 4*** (0.001 8)	0.167 6*** (0.024 7)
存贷比	0.001 8*** (0.000 4)	0.120 4** (0.048 2)	0.000 5 (0.001 4)	0.002 5 (0.002 4)	0.096 1*** (0.018 6)
市场化水平	0.088 4 (0.074 5)	8.007 9 (8.738 0)	0.181 0 (0.255 5)	-0.069 2 (0.166 1)	-2.842 0 (2.767 2)
金融业竞争水平	-0.073 4 (0.048 8)	-3.362 5 (5.433 7)	0.013 6 (0.181 5)	-0.067 4 (0.116 2)	-2.002 2 (1.870 0)
常数项	-0.312 1 (0.707 6)	-157.647 9* (82.914 8)	-1.584 1 (1.743 3)	9.184 4*** (2.229 0)	-21.626 0 (31.117 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R^2$	0.744 7	0.177 5	0.360 3	0.321 9	0.577 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其中，列（1）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广度的代理指标贷款户数，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服务深

度的代理指标户均贷款余额。回归结果显示，量化定位监管对贷款户数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对户均贷款余额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量化定位监管措施的实施,促使村镇银行贷款户数增加和户均贷款余额下降,助推村镇银行服务广度增加和服务深度拓展,有助于促进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实现,假设1得到验证。

考察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列(3)、列(4)和列(5)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盈利性的代理指标资产利润率、安全性的代理指标不良贷款率和成长性的代理指标贷款规模增长率。结果显示,量化定位监管对资产利润率的系数不显著,对不良贷款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贷款规模增长率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实施量化定位监管政策显

著提高了不良贷款率和降低了贷款规模增长率,削弱了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总体上抑制了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实现。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安全性和成长上。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考虑量化定位监管的时滞效应

引入量化定位监管政策实施1年以后( $regulation_1$ )这一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不变,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考虑时滞效应

变量	社会绩效		财务绩效		
	服务广度	服务深度	盈利性	安全性	成长性
	(1)	(2)	(3)	(4)	(5)
量化定位监管	1.025 7*** (0.300 8)	-90.758 1*** (28.912 3)	-0.804 0 (0.722 7)	2.116 1*** (0.768 6)	-71.330 3*** (18.154 9)
监管政策实施1年以后	1.176 2*** (0.269 2)	-117.189 4*** (21.238 5)	-1.008 5* (0.554 5)	2.740 7*** (0.682 9)	-39.834 8** (17.554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R^2$	0.744 7	0.177 5	0.360 3	0.321 9	0.577 8

列(1)和列(2)显示,量化定位监管仍然能显著提升村镇银行的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假设1依然成立。监管政策实施1年以后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绝对值大于量化定位监管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说明量化定位监管政策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正向影响存在逐渐强化的时滞效应。

列(3)至列(5)显示,量化定位监管仍然显著影响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对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结果稳健。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政策实施1年以后对村镇银行盈利性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安全性的回归系数大于量化定位监管的回归系数,对成长性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小于量化定位监管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说明量化定位监管政策对村镇银行盈利性的抑制效应存在时滞,对安全性的抑制效应逐渐增强,而对成长性的抑制效应逐渐减弱。

#### 2. 替换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度量指标

本文使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村镇银行盈利性

的替代指标,使用不良资产率作为安全性的替代度量指标,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成长性的替代度量指标进行再检验,得到如表5所示的结果。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财务绩效的度量指标

变量	(1)	(2)	(3)
	盈利性	安全性	成长性
量化定位监管	-15.625 3 (10.764 3)	2.094 9** (0.813 7)	-178.356 9*** (46.092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R^2$	0.413 1	0.309 2	0.645 5

结果表明,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而对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 3. 剔除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点的样本

为了排除2008年金融危机事件的不利冲击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本文剔除2008年的样本后再重新进行基准回归,得到如表6所示的回

归结果。其中，列（1）和列（2）为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影响的结果，列（3）至列（5）为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结果。

量化定位监管在 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促进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和抑制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剔除 2008 年的样本

变量	社会绩效			财务绩效	
	服务广度 (1)	服务深度 (2)	盈利性 (3)	安全性 (4)	成长性 (5)
量化定位监管	1.768 8*** (0.479 2)	-179.337 6*** (39.431 0)	-1.014 2 (0.956 0)	4.458 8*** (1.230 6)	-92.746 2*** (30.829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60	3 760	3 760	3 760	3 760
R <sup>2</sup>	0.721 9	0.180 7	0.368 3	0.322 5	0.552 3

## 六、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 （一）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使用网点数量和每百万元资产的人员配置分别作为“基层网点扩张”和“人员配置增加”机制检验的中介变量代理指标，并采用 Baron & Kenny 的经典三步法<sup>[24]</sup>对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表 7 所示的结果。由列（1）至列（3）的结果可知，量化定位监管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村镇

银行的网点数量，同时网点数量在 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村镇银行的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说明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增加村镇银行的网点数量而提升其社会绩效，“基层网点扩张”机制存在，假设 3 成立。由列（4）至列（6）的结果可知，量化定位监管在 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人员配置，同时人员配置在 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说明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增加村镇银行的人员配置数量而提升其社会绩效，“人员配置增加”机制存在，假设 4 成立。

表 7 “基层网点扩张”和“人员配置增加”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基层网点扩张			人员配置增加		
	基层网点 (1)	服务广度 (2)	服务深度 (3)	人员配置 (4)	服务广度 (5)	服务深度 (6)
量化定位监管	3.855 9* (2.157 2)	2.126 8*** (0.506 4)	-201.776 8*** (45.489 4)	0.057 3*** (0.012 7)	2.174 0*** (0.564 4)	-205.709 3*** (48.240 8)
基层网点		0.046 7*** (0.006 8)	-3.836 9*** (0.778 8)			
人员配置					0.179 5** (0.070 6)	-14.416 2** (6.002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R <sup>2</sup>	0.448 6	0.754 4	0.192 4	0.453 1	0.746 0	0.179 4

### （二）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检验

使用营业支出占比作为“交易成本增加”机制检验的中介变量的代理指标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表 8 所示的结果。在前文的基准回归分析中，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而对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均存在抑制效应。根据

温忠麟和叶宝娟的观点<sup>[25]</sup>，在总效应不显著的情况下，间接效应仍然可能存在，因为可能存在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或者不同中间渠道的间接效应相反而相互抵消，导致总效应被遮掩的情况，即表现为“遮掩效应”。所以，在此实证检验“交易成本增加”机制影响村镇银行盈利性、安

全性和成长性的间接效应。

表8 “交易成本增加”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交易成本	盈利性	安全性	成长性
量化定位监管	2.121 8*** (0.714 6)	-1.001 0 (1.372 7)	4.867 8*** (1.431 3)	-101.711 4*** (36.323 3)
交易成本		-0.382 5* (0.210 8)	-0.005 2 (0.037 8)	-4.455 4*** (1.337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R <sup>2</sup>	0.247 8	0.394 9	0.321 9	0.587 9

在表8的列(1)中,量化定位监管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量化定位监管会增加村镇银行的交易成本。在列(2)中,交易成本在10%的水平上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量化定位监管会增加交易成本进而削弱村镇银行的盈利性,但该间接抑制效应可能被其他中间渠道的促进效应所抵消,导致量化定位监管影响村镇银行的盈利性的总效应不显著,表现为“遮掩效应”。

由表8列(3)的估计结果可知,量化定位监管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交易成本对安全性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交易成本增加”机制不是量化定位监管抑制村镇银行安全性的主要作用路径。列(4)的估计结果显示,量化定位

监管和交易成本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村镇银行的成长性,说明“交易成本增加”机制是量化定位监管削弱村镇银行成长性的重要机制。

综上可得,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的抑制效应通过增加交易成本而削弱村镇银行的成长性来实现,假设5成立。

## 七、金融科技发展在量化定位监管影响村镇银行绩效中的调节作用

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能助推村镇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科技赋能改进业务流程和创新业务模式。一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金融科技发展是否有助于村镇银行实现量化定位监管的目标。本文借鉴李春涛等的研究<sup>[26]</sup>,使用百度新闻高级检索中分年度各地区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新闻数量作为金融科技发展的度量指标,并在基准回归方程中加入金融科技发展与量化定位监管的交互项,检验金融科技发展的调节作用。表9的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发展在量化定位监管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是对盈利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金融科技发展能促进村镇银行服务更多小微群体,对实现普惠金融的监管目标是有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村镇银行这样的小银行,数字化建设的前期成本更难分摊,会加剧盈利性恶化。

表9 金融科技发展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服务广度	服务深度	盈利性	安全性	成长性
量化定位监管	2.346 2*** (0.541 5)	-232.742 1*** (47.097 6)	-1.935 0 (1.257 3)	5.307 6*** (1.446 8)	-117.875 5*** (35.545 9)
金融科技发展×量化定位监管	0.241 6*** (0.058 4)	-26.393 4*** (6.790 4)	-0.231 5* (0.137 3)	0.011 9 (0.114 4)	-3.589 3 (2.455 9)
金融科技发展	-0.118 0* (0.064 0)	16.428 4** (7.100 7)	0.106 9 (0.167 4)	-0.179 6 (0.127 6)	3.542 0 (2.575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3 789
R <sup>2</sup>	0.748 8	0.187 8	0.361 4	0.322 4	0.578 4

注:根据李春涛等的观点<sup>[26]</sup>,由于各地区金融科技相关关键词的新闻数量这一指标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右偏性,所以此处将该指标取自然对数后再纳入回归模型。

## 八、结论及其启示

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解决或消除市

场失灵的重要手段。监管部门针对村镇银行实施量化的定位监管措施,对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如何,是本文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

2008—2016 年 900 家村镇银行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系统地考察了量化定位监管与村镇银行双重绩效的关系,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影响机制的存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金融科技发展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结论:首先,量化定位监管提升了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但对财务绩效产生抑制作用。具体而言,量化定位监管通过“基层网点扩张”和“人员配置增加”机制对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量化定位监管对村镇银行的盈利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安全性和成长性具有抑制效应;“交易成本增加”是量化定位监管削弱村镇银行成长性的重要机制,但对盈利性的间接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对安全性没有发挥中介效应。2020 年开始,村镇银行进入机构整合期,有多家村镇银行被主发起行吸收合并后改建为分支机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结论是符合现实环境变化的,正是因为财务绩效不佳,村镇银行才会持续进行结构性重组。其次,金融科技发展能增强量化定位监管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但是对盈利性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金融科技发展能促进村镇银行服务更多小微群体,对实现普惠金融的监管目标是有益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村镇银行这样的小银行,数字化建设的前期成本更难分摊,会加剧盈利性恶化。

上述结论对于完善村镇银行监管制度和协调村镇银行双重目标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应发挥主发起行的多维优势,助力村镇银行适应量化定位监管要求,提升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量化定位监管措施有助于提升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但是对村镇银行的安全性和成长性产生抑制效应,对其商业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冲击。主发起行制度是村镇银行相较于其他商业银行所独有的特征。主发起行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较为雄厚,理应充分发挥其多维优势,在人员、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助力村镇银行提升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量化定位监管要求下更好地兼顾社会绩效目标与财务绩效目标。

第二,加快欠发达地区经营主体和村镇银行数字化转型进程,降低村镇银行的守法成本。在现阶段,由于数字化建设成本较高,村镇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较慢,贷款技术仍然以关系型贷款为主。同时,欠发达地区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有限,数

据的线上沉淀不足,数据资产的价值尚未充分发挥。在量化定位监管要求下,村镇银行主要通过增加基层网点和人员配置等成本较高的方式深化金融服务,守法成本较高。为进一步减轻村镇银行拓展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的成本压力,有必要融合政府财政资金、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等多方力量,推动欠发达地区经营主体和村镇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逐渐实现数字技术的规模经济。

第三,强化定位监管措施,适度提升审慎经营指标的监管刚性。在村镇银行发展的现阶段,应该强化量化定位监管,设计差异化的监管措施。建议继续强调村镇银行支农支小的政策目标,引导村镇银行建立以存、贷、汇等基础金融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继续对信贷资金投向农户和小微企业比例进行监测,设计完善特色化监管指标体系,防止信贷资金过度流向非农领域,确保村镇银行支农支小政策目标的实现。制定合理监管政策,将村镇银行的多维财务绩效指标纳入监管指标体系,促进村镇银行的稳健经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村镇银行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角度出发,村镇银行在其经营上应该有独立性和自主性,量化定位监管实际上是对村镇银行业务经营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约束,这样的措施在未来应该适时减少。

#### 注释:

- ① 守法成本 (Compliance Costs) 又称为执行成本,指金融机构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而额外承担的成本,包括额外增加的人力资本、办公设施、专门律师等方面的费用支出<sup>[6]</sup>。
- ② 关系型信贷是指商业银行基于与客户的长期联系和多渠道接触所积累的关于借款者的内部信息来进行信贷决策的贷款方式。这些内部信息包括借款者的信誉、品格和家族历史等重要且难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取的“软信息”,可作为财务数据、抵押物等“硬信息”的替代<sup>[11]</sup>。
- ③ 绝大多数村镇银行的财务数据不对外公开,只能通过调研方式获取,所以这套覆盖了中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连续 9 年的村镇银行数据非常珍贵。但因为调研成本太高、难度大,后续未再实施跟踪调查,无法获取近年的数据。
- ④ 统计口径与监管部门保持一致,包括中国大陆地区 21 个省(不含青海)、4 个自治区(不含西藏)、4 个直辖市共计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5 个计划单列市。

#### 参考文献:

- [1] 徐淑芳,彭馨漫. 微型金融机构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 2014(12): 49-58.

- [2] 李海峰. 微型金融机构的绩效分析: 一个全球视角[J]. 农村金融研究, 2015(2): 64-70.
- [3] HARTARSKA V, NADOLNYAK D. Do regulated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achieve better sustainability and outreach? Cross-country evidence[J]. Applied Economics, 2007, 39(10): 1207-1222.
- [4] DEMIR 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private investment and portfolio choice: Financialization of real sectors in emerging marke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88(2): 314-324.
- [5] CULL R, DEMIRGÜÇ-KUNTA, MORDUCH J. Does regulatory supervision curtail microfinance profitability and outreach?[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6): 949-965.
- [6] 阎庆民. 中国银行业监管效率分析[J]. 金融研究, 2002(8): 75-81.
- [7] 彭俞超, 何山. 资管新规、影子银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世界经济, 2020, 43(1): 47-69.
- [8] KANE E J. Accelerating infl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regul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81, 36(2): 355-367.
- [9] PLANTIN G. Shadow banking and bank capital regulation[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5, 28(1): 146-175.
- [10] 陈晓洁, 何广文, 陈洋. 数字鸿沟与农户数字信贷行为——基于2019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J]. 财经论丛, 2022(1): 46-56.
- [11] 王天赐. 以关系型信贷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J]. 经济体制改革, 2012(3): 121-125.
- [12] CHRISTEN R P, LYMAN T, ROSENBERG R. Guiding principles on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microfinance[R]. Washington DC: CGAP, 2003.
- [13] 阿芒达利兹, 默多克. 微型金融经济学[M]. 罗煜, 袁江, 译. 北京: 万卷出版公司, 2013.
- [14] YARON J. Successful rural finance institutions[J].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994. 31(1): 32-35.
- [15] 葛永波, 赵国庆, 王鸿哲. 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山东省的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9): 79-88.
- [16] 葛永波, 周倬君, 马云倩.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透视[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 35(12): 48-54, 111.
- [17] 张正平, 何广文, 梁毅菲. 微型金融机构社会绩效研究进展述评[J]. 经济学动态, 2012(1): 141-145.
- [18] 何广文, 李倩. 财税扶持与村镇银行绩效: “发展论”还是“依赖论”?——来自全国 1177 家村镇银行面板数据的证据[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5-18, 205.
- [19] 董晓林, 程超, 龙玲华. 主发起人类型、设立取址与村镇银行经营绩效——以江苏为例[J]. 财贸研究, 2014, 25(2): 116-121.
- [20] 范亚辰, 何广文, 杨虎锋. 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承担与社会绩效——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5): 71-81.
- [21] 何婧. 中小银行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美数据的对比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4, 35(1): 27-32.
- [22] 张正平, 王麦秀. 小额信贷机构能兼顾服务穷人与财务可持续的双重目标吗?——来自国际小额信贷市场的统计证据及其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1): 98-109.
- [23] 张正平, 夏玉洁, 杨丹丹. 小额信贷机构的双重目标相互冲突吗——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检验与比较[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4): 16-27.
- [2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 [25]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26] 李春涛, 闫续文, 宋敏, 等. 金融科技与企业创新——新三板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1): 81-98.

责任编辑: 李东辉